

舍利與佛塔

■ 張文玲

院藏唐天祐二年（905）銘，〈鍍金銅板舍利塔〉很可能與唐宋之際，各地流傳的阿育王塔信仰有關，據此，筆者想探究印度孔雀王朝的舍利信仰與佛塔建造。本文依據印度及歐洲學者，百年來對佛陀舍利及印度早期佛塔的發掘研究，¹並用筆者三十年來四度（1990，1998，2004，2005）到印度考察所拍攝之圖片加以說明，從八王分舍利說起，探討最初的佛塔、早期印度佛教的舍利供奉方式、孔雀王朝阿育王所造之塔與舍利容器，藉此梳理一些舍利與佛塔相關的歷史文化背景，以助觀眾在觀賞院藏的鍍金銅板舍利塔時，能有更深入的理解與欣賞。

院藏唐天祐二年銘，鍍金銅板舍利塔（圖 1-1），由可重組的塔座、塔身、塔頂和塔剎四部份疊置而成。若將塔身與塔座分開，俯視塔座，則可見四方形塔座的邊框上刻有銘記：「天祐二年三月五日敬造／舍利塔一座

為父母／一切眾生咸同斯福」。〈圖 2〉方形塔身四面，各開一圓拱形龕，龕兩側各一立鳥，各龕分別透雕不同的本生故事，如圖 1-2 所示之透雕內容為《大方便佛報恩經》卷五所述：「布施一切，不逆人意」以及《菩薩本



圖 1-2 | 唐 天祐2年銘 鍍金銅板舍利塔 局部 月光王本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1-1 | 唐 天祐2年銘 鍍金銅板舍利塔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2 | 唐 天祐2年銘 鍍金銅板舍利塔 基座銘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緣經》卷二：「菩薩摩訶薩，行無上道時，為諸眾生故，乃至捨頭目」的月光王本生。² 塔頂四角各設一座山花蕉葉，中心處立塔刹，全塔外層之鍍金幾已褪盡。

此塔之造型及裝飾風格，與多件出土於江南地區，名為「阿育王塔」的金屬塔有很多相似之處，例如：2001年杭州雷峰塔地宮出土，五代吳越國國王錢弘俶所造的「鑿金銀阿育王塔」；2008年南京長干寺地宮出土佛頂真骨的「七寶阿育王塔」；以及2016年上海青浦區隆平寺塔地宮出土的北宋銅阿育王塔。本院所藏這座鍍金銅板舍利塔，造於唐天祐二年，時間上較上述諸塔以及史載錢弘俶（929-988）仿印度阿育王造塔典故，所造之八萬四千塔都要早。

八王分舍利

釋迦牟尼佛入滅於末羅族（Malla）人的都城拘尸那羅（Kusinagara），末羅族人以輪王葬法來進行荼毗，最初末羅族國王試圖獨自保有全部的佛陀舍利，但其他部族的首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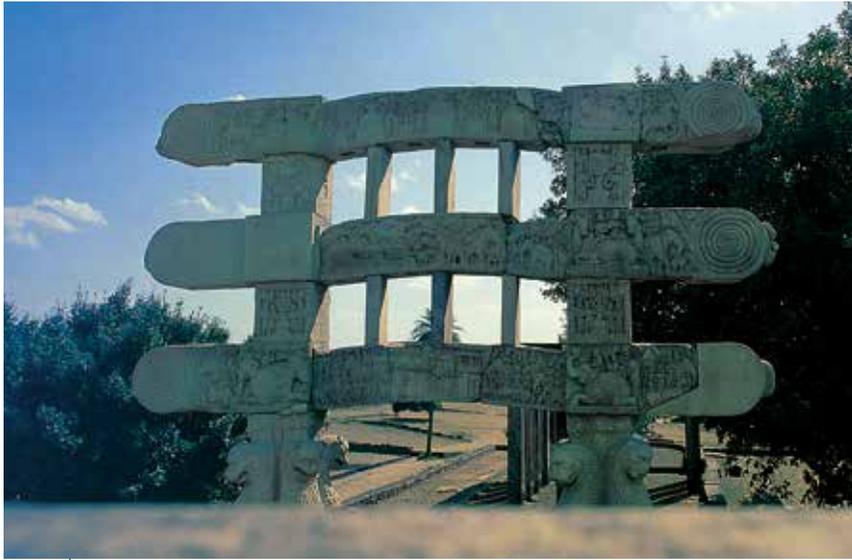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3-1 | 桑奇一號佛塔南門橫樑浮雕 1998年作者攝



圖 4-1 | 西元前2世紀後半葉 巴爾戶佛塔浮雕 載運舍利 1998年作者攝於印度新德里國立博物館 (National Museum, New Delhi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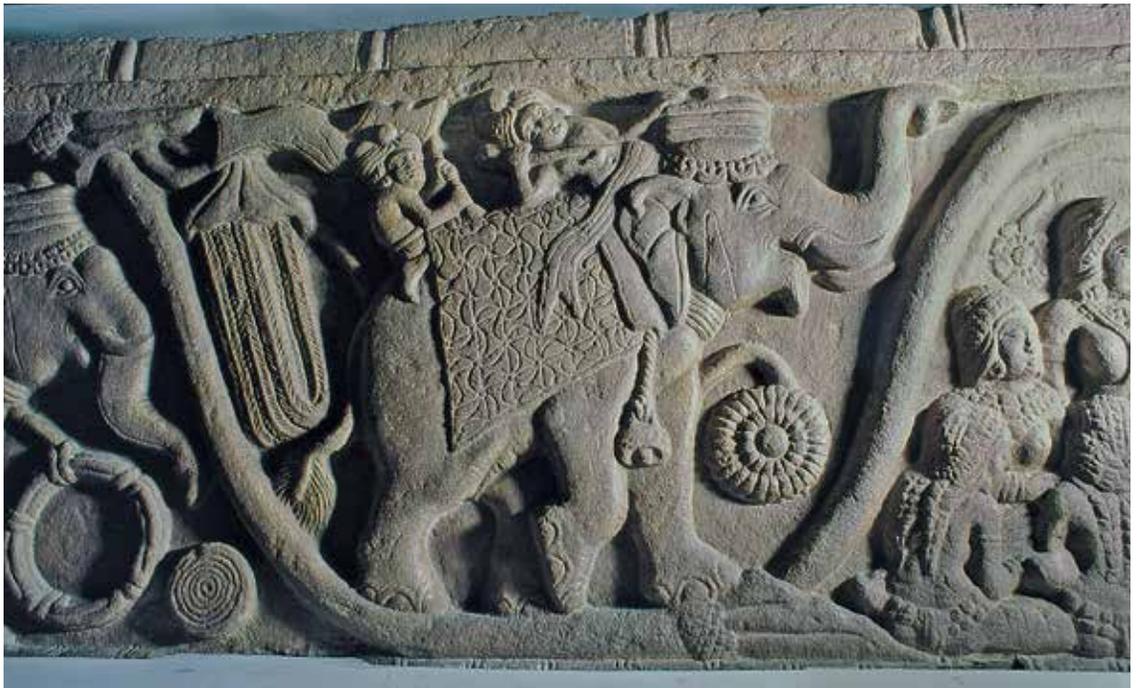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4-2 | 西元前2世紀後半葉 巴爾戶佛塔浮雕 載運舍利 局部 1998年作者攝於印度新德里國立博物館



圖 3-2 | 桑奇一號佛塔南門最下層橫樑浮雕 1998年作者攝

也想分得，於是大軍齊集於拘尸那羅城下，準備攻城。此一爭分舍利的歷史事件，被刻劃於印度中部桑奇（Sanchi）一號佛塔南門最下層的橫樑上（圖 3-1），浮雕右段為乘坐戰車和騎於大象上的軍隊；中段刻劃出古代拘尸那羅城的建築以及城內的備戰狀況。為了避免戰事的發生，香姓婆羅門（Drona）將舍利分成十份：八份來自佛陀的遺骨，一份來自佛陀火化後的灰燼（據此建為炭塔），另一份為用來分舍利的容器（據此建為瓶塔）。南門橫樑左半段浮雕顯示：分得佛陀舍利的首領們，分別乘坐戰車和大象離去，他們將裝有佛骨舍利的盒子放在大象頭上，載運回國。（圖 3-2）古代佛陀遺骨的搬運方式，除了桑奇一號佛塔南門浮雕外，建造年代約在西元前二世紀後半葉的印度巴爾戶（Bhārhut）佛塔，也生動地紀錄了以大象載運舍利的方式。（圖 4-1、4-2）大象是王者的坐騎，婆羅門教中的眾神之神因陀羅（Indra），其坐騎便是大象。以大象來載運佛骨舍利，這是符合王族出身，且被視為轉輪王的釋迦摩

尼佛的。而一件西元 2 ~ 4 世紀的犍陀羅浮雕，則刻畫了以駱駝運送佛骨舍利的方式（圖 5），這應該是犍陀羅藝術所呈現的地域性特色。

八個分得舍利的部族與國家名稱記載於《長阿含經》卷四、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卷三九、《十誦律》卷六十等佛經中。³當時所建之塔位於何處？透過考古與佛典的比對，有多處已確認，以下列出較為明確且著名的三處：一、佛陀時代的大國，摩揭陀國（Magadha）都城，王舍城（Rājagṛha），位於今印度北部比哈爾邦（Bihar）南部那爛陀（Nalanda）地區；二、離車族（Licchavi）所在的吠舍離（Vaiśālī），同樣位於比哈爾邦；三、釋迦族所在地迦毘羅衛（Kapilavastu），位於今印度與尼泊爾邊境。

最初的佛塔

八王分得舍利後所建之塔，今已不見其原貌，然而，1958 年印度巴特那（Paṭnā）研究院，由 Kashi Prasad Jayaswal 所領導的考古團隊在吠舍離發現了一座低矮的佛塔，其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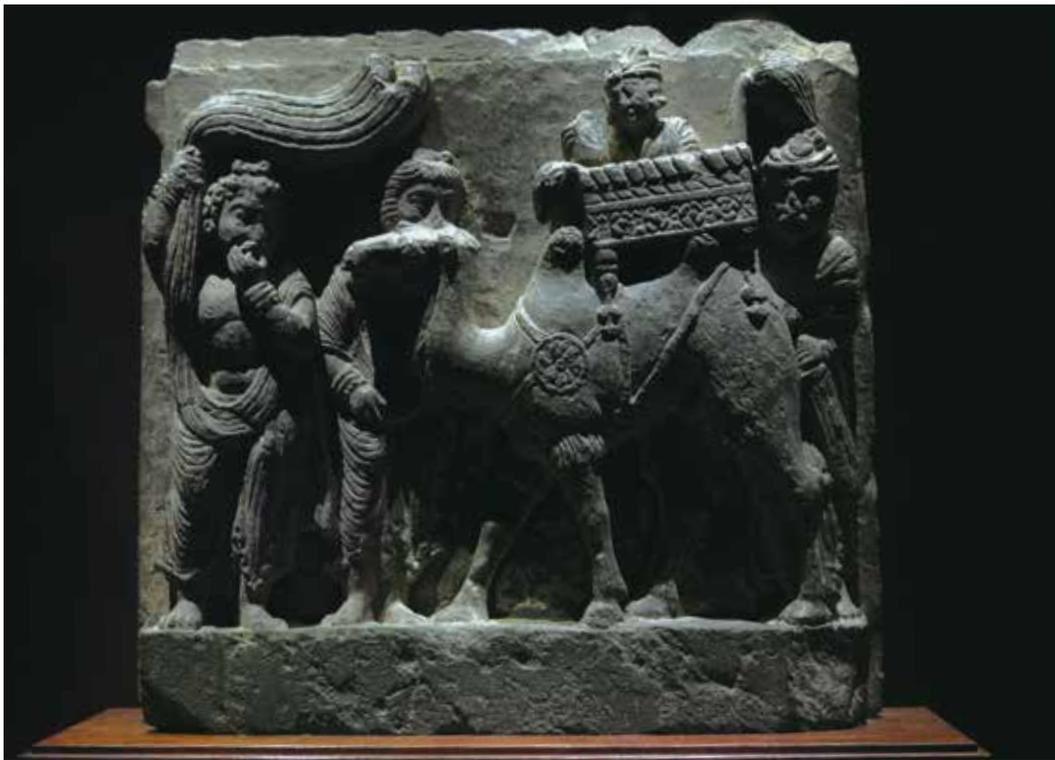


圖5 | 西元2~4世紀 犍陀羅浮雕，運送佛骨舍利。 2018年作者攝於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

心為直徑 8.07 公尺的小泥塔，高度可能為 3.45 公尺，僅用泥土而沒用曬乾的磚來建造。這座小泥塔是由一層層的土相互堆砌而成，每一層土之間由較薄的硬結層（kankar）和凝塊狀粘土層分開。佛塔很可能直接建於地面上，沒有人造的黏土平台（medhi）圍繞四周。在這座原始佛塔的中心處有一個古老的切割痕跡，塔內發現了一個滑石容器，內裝一小撮灰泥（由於阿育王將佛陀舍利分散多處，所以每個佛塔內的舍利很可能只有一小撮）、一片金葉、兩顆玻璃珠、一個小海螺及一枚銅幣。這座低矮土丘可能就是八王分舍利後，離車族所建的舍利塔，而塔中心處的橫溝應是阿育王為了開塔取舍利所鑿。這座原始舍利塔後來經歷了多次的擴建，首次在孔雀王朝（Maurya）阿育王之時，接著為巽迦王朝（Śuṅga）和之後的貴霜王朝（Kuṣāṇa /

Kushan）。每次的擴建都使用燒造過的磚塊為建材，用磚包住原先之塔，使佛塔直徑增加到 12 公尺之大。⁴

早期印度佛教的舍利供奉方式

所謂的「舍利」，應為梵文 śarīra 的音譯，此梵文字意泛指與身體有關的事物；而另一意則為「具體化的靈魂或精神」，⁵這更符合佛教中所說的佛陀或聖者的遺骨。一般認為，舍利都是埋放在佛塔內，大多數的情況卻是如此。然而，近百年來的考古發掘與藝術史研究顯示，舍利不一定只埋放在塔內，還有其他的放置與禮敬方式。1898 年英國工程師 William Claxton Peppé 挖掘了離尼泊爾南部邊境不遠處的皮普拉瓦（Piprahwa）佛塔（圖 6-1），其覆鉢體高約 3.66 公尺，寬 18.9 公尺（圖 6-2），所示為筆者立於佛塔前，由



圖 6-1 | Piprahwa佛塔全景 2004年作者攝



圖 6-2 | 作者立於Piprahwa佛塔前 2004年胡進杉攝



圖 7-1 | 藍毗尼遺址 阿育王石柱 2004年作者攝

此可見其高度比例。從塔頂下挖十餘英尺後，發現了一個大石函，長 132.16 公分，寬 81.96 公分，高 66.71 公分，重量近 700 公斤。其函體與函蓋分別用一塊巨大砂岩製成，裡面裝有五個舍利容器。

1896 年在藍毗尼 (Lumbinī) 發現了阿育王時代以砂岩製成的石柱 (圖 7-1)，依此確定了藍毗尼為佛陀的出生地。這種石材與上述大石函所用的石材相同，都是取自印度恆河支流亞穆那河 (Yamuna) 河畔的砂岩。德國柏林自由大學考古學及古印度語言學教授，哈利福克博士 (Dr. Harry Falk) 對石柱上所刻五行銘文⁶ (圖 7-2) 作了如下的解讀與詮釋：阿育王執政的第二十年，阿育王親抵藍毗尼向佛陀致敬，並立了一根石柱，同時免

除了此地的稅，使藍毗尼成為「aṭhabhāgiya」(梵文為 aṣṭabhāgika)。此字意指「與八份相關的」。所謂的「八份」，即指佛涅槃後，原先八王分得的八分舍利。當時的藍毗尼是個小村莊，並沒有分到佛陀舍利。阿育王使藍毗尼成為「與八份相關的」，那應該就是指，阿育王打開當時八王所建舍利塔中的七個，取出舍利，將其中部分舍利放到藍毗尼。由於石柱銘文中提及阿育王以石材造了一個「vigadabhi (ca)」，可能即為石函，而並沒有提及他在此地建造或擴建了佛塔。因此，推測「vigadabhi (ca)」的功能很可能便是取代佛塔，而用來放置舍利。阿育王將舍利壇放入「vigadabhi (ca)」置於樹前，或以柵欄圍繞之，以供信眾瞻仰頂禮。⁷ 這種直接觀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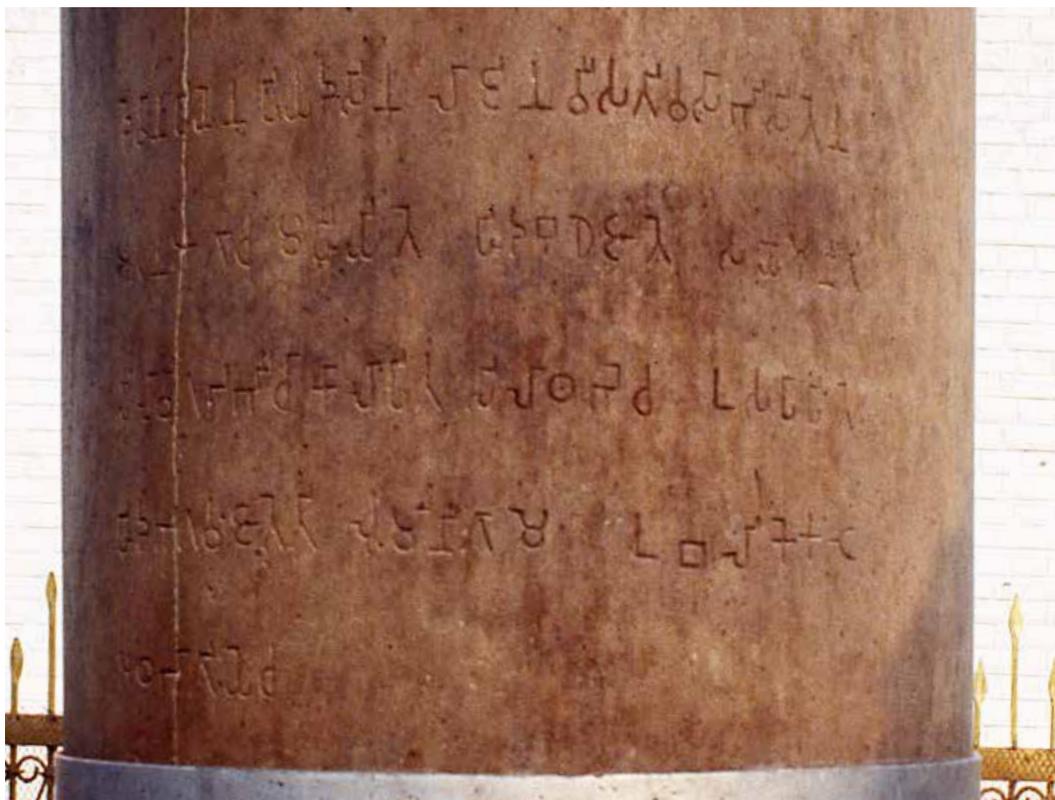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7-2 | 藍毗尼阿育王石柱上銘文 2004年作者攝

佛陀遺骨的描述，可見於北涼三藏法師曇無讖所譯《金光明經》卷第四〈捨身品〉中：「爾時佛告尊者阿難：『汝可開塔取中舍利示此大眾，是舍利者，乃是無量六波羅蜜功德所熏。』爾時阿難，聞佛教傷即往塔所，禮拜供養開其塔戶，見其塔中有七寶函，以手開函，見其舍利色妙紅白。」

在皮普拉瓦佛塔中所發現的大石函，可能就是原先阿育王在藍毗尼以石材所造的「vigadabhi (ca)」。那為何這石函被發現於釋迦族故鄉境內的皮普拉瓦而不在藍毗尼？這應與孔雀王朝的覆滅有關。阿育王過逝不久，孔雀王朝被巽伽王朝所滅，婆羅門重獲政治優勢，佛教不再受到像阿育王時的護持，藍毗尼在當時很可能面臨巨大的威脅，為了保存

佛陀舍利，故將石函移置於距藍毗尼直線距離僅十五公里，位於釋迦族境內的皮普拉瓦。且當時很可能多處僧院所保有的佛陀舍利，都一起集中埋放於皮普拉瓦的磚造佛塔之下。⁸

最近的研究顯示：將佛骨舍利放置入石函內，供人瞻仰的情形，在西元一世紀前後所造的桑奇佛塔四個石門的浮雕上已刻畫出來了。一直以來，桑奇佛塔浮雕中，信眾頂禮空置的「法座」（圖 8），被解讀為早期無佛像時代中，信眾頂禮坐在法座上的佛陀，只是佛陀沒有被刻劃出來。但若仔細看石雕上信眾頂禮「法座」的整個構圖，會發現信眾頂禮的「法座」狀似有蓋子的石函，其造型與薩達拉（Satdhāra）佛塔內放置舍利的石函相同，且信眾頂禮的方向是頭直接朝向石函，而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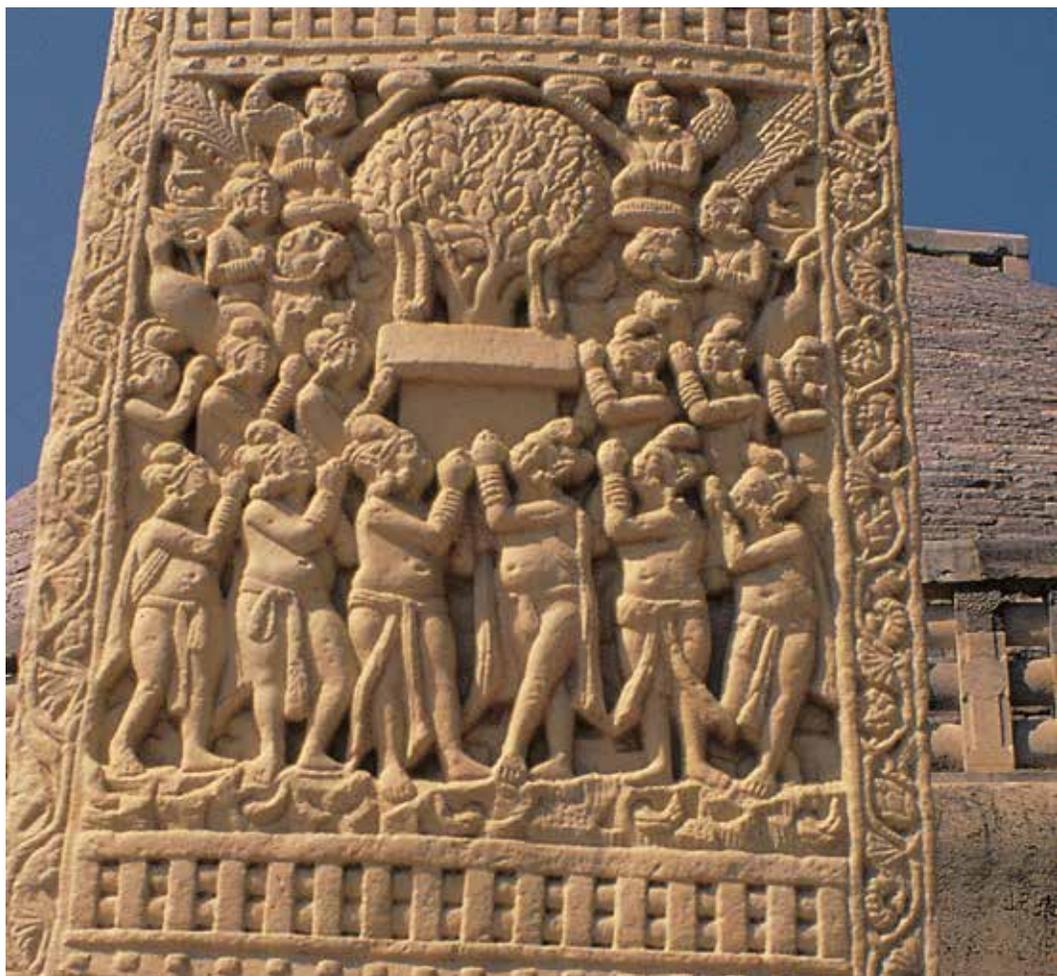


圖8 | 西元1世紀前後 桑奇佛塔西門浮雕 頂禮舍利石函 1998年作者攝

是朝向「法座」上方，沒刻畫出來的佛陀。因此，桑奇佛塔浮雕中，信眾頂禮的應該是裝有舍利的石函，而不是「法座」。⁹ 上述頂禮舍利石函的表達方式，在建造於西元前二世紀後半葉的巴爾戶佛塔浮雕上便已出現，如圖9所示，一對善男信女正跪拜於舍利石函左右兩側，有著蓋子的石函位於樹前方，並以多種花卉嚴飾之。（圖10）所示也是信眾直接跪拜石函本體，禮拜者頭上戴有類似眼鏡蛇般的頭飾，象徵擬人化的伊羅繫那（Erapata）龍王對佛骨舍利的頂禮。從桑奇和巴爾戶兩處佛塔浮雕上有禮敬佛塔（圖11），也有禮

敬石函的刻繪推測，早期印度佛教的舍利供奉方式，應該不只有禮敬佛塔，而還有禮拜供奉著佛陀舍利的石函。

阿育王所建的塔

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阿育王，其統治時期約為西元前268至232年，除了南印度部分地區外，幾乎統一了整個印度半島，乃印度歷史上空前強盛的時代。阿育王打開原先八王所建之塔，取出舍利，廣建佛塔。他借由一小撮佛陀舍利而聖化了無數寺院，將佛教推行至全國及疆域外的其他地區。阿



圖9 | 西元前2世紀後半葉 巴爾戶佛塔浮雕 頂禮舍利石函 1998年作者攝於印度加爾各達印度博物館 (Indian Museum, Calcutta)



圖10 | 西元前2世紀後半葉 巴爾戶佛塔浮雕 伊羅槃那龍王頂禮舍利石函 2005年作者攝於印度加爾各達印度博物館

育王將佛塔從粘土改建以磚頭，並發展最新的石材雕刻技術，莊嚴他的疆域及佛教聖地，例如：他在佛陀初轉法輪聖地鹿野苑所立的石柱，其柱頭（圖 12-1）雕刻，與打磨技術呈現出精湛的技藝與成就，而從現今尚存於鹿野苑遺址的石柱及銘文（圖 12-2）可知阿育王在弘揚佛法之際，也關注僧團的清靜與和諧。

現今很難看到阿育王所造之塔的全貌，因為大多數不是被破壞，便是被後代擴建而改變了原貌。但現今依舊可從幾處遺留下來的古塔一探其梗概，例如：在吠舍離遺跡中，有一個磚造的佛塔，在佛塔不遠處立了一根石柱（圖 13-1），這石柱有著蓮花式柱頭，其上方有一圈繩紋，最上端的長方形柱頭板上坐著一隻石獅（圖 13-2），這石柱上雖無任何阿育王的銘文、但依其造型設計及工藝



圖11 | 西元1世紀前後 桑奇佛塔北門浮雕 禮敬佛塔 1998年作者攝

技術，可以確定是阿育王石柱。由於這個磚造的佛塔與石柱相距不遠，故推定這座塔的核心部分是建於阿育王時期。¹⁰

位於印度中部波帕爾（Bhopal）的桑奇佛塔附近，有多處佛塔遺跡，其中距離桑奇佛塔西南約六哩遠的薩達拉（Satdhāra，亦即七河之意）二號佛塔中，十九世紀末英國考古學家 Alexander Cunningham 發現了兩個斑駁的滑石舍利瓶，在蓋子的內側分別刻有銘文：「舍利弗之遺骨」及「摩訶目犍連之遺骨」。筆者於 1989 年到訪此地時，多處塌毀的磚造佛塔，正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原始磚塊一一編號（圖 14），進行整修。此遺址中的佛塔都是磚造的覆鉢形體，其實心的塔身由泥土與磚塊建構而成。（圖 15）這些塔被印度考古學院認定為阿育王時期所建。¹¹

印度考古研究院根據考古發掘記錄較為完整，位於巴基斯坦塔克西拉（Taxila）附近的法王塔（Dharmarājikā）推測，阿育王所造的舍利塔，比起最早的佛塔，已經有所革新。以法王塔為例，其塔身（anda）為磚造覆鉢體，直徑約 48 英尺，高度不明。覆鉢形塔身的下方增加了高度約 60 英尺的平臺（medi），作為塔基，其作用可為放置祭祀用具之臺面。塔身頂端立有一個或多個傘蓋（chhatrāvali），而傘蓋四周圍繞以一個方形柵欄（平頭）（harmika）。¹²與法王塔相似的覆鉢形塔身以及平臺，也見於上述薩達拉遺址中的佛塔。

目前雖然無法看到阿育王所造佛塔的原貌，但可從尚存於孟買地區，開鑿於西元前二世紀的 Bhaja 石窟第十二窟，支提窟（chaitya）內的石造佛塔（圖 16），看到類似於阿育王時期所造佛塔的平臺（塔基）與覆鉢形塔身。而當時信眾對佛塔的裝飾，如



圖 12-1 鹿野苑阿育王石柱柱頭 2004年作者攝於印度鹿野苑考古博物館（Archaeological Museum, Sarnath）



圖 12-2 鹿野苑阿育王石柱銘文 1990年作者攝於印度鹿野苑遺址



圖 13-1 | 吠舍離遺址上的磚造佛塔及阿育王石柱 1998年胡進杉攝



圖 13-2 | 吠舍離遺址上阿育王石柱柱頭板上的獅子 1998年作者攝



圖 14 | 1998年整修Satdhāra遺址內磚造佛塔之情況 1998年作者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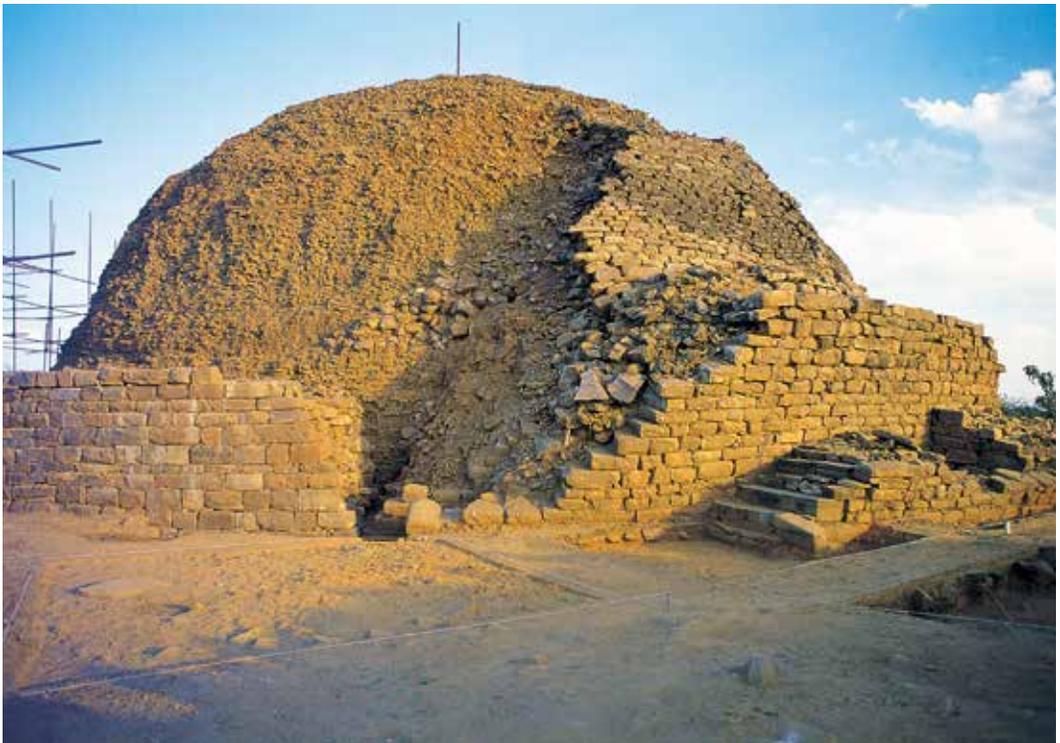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15 | Satdhāra遺址中磚造的覆鉢形佛塔 1998年作者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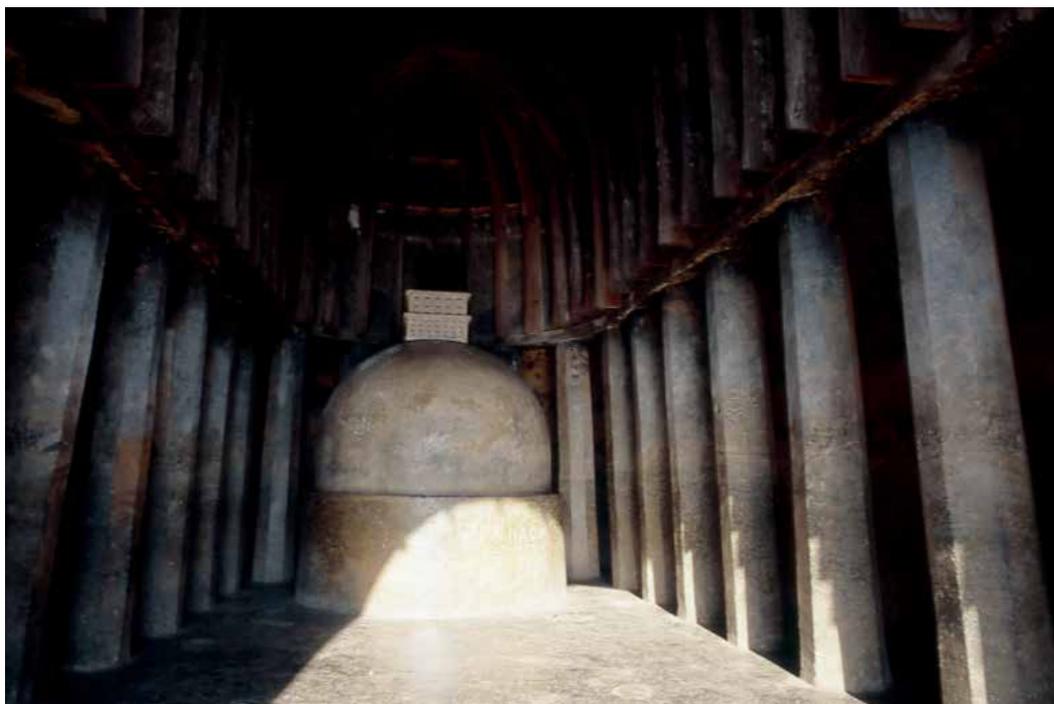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16 | 西元前2世紀 Bhaja石窟第12窟的支提窟 (chaitya) 1998年作者攝

同《長阿含經》卷四中的記載：佛告阿難：「阿難！汝欲葬我，……訖收舍利，於四衢道起立塔廟，表刹懸繒，使諸行人皆見佛塔，思慕如來法王道化」，其中所謂的「表刹懸繒」或可從建造於西元一世紀前後，桑奇佛塔北門浮雕上的佛塔刻繪想見一般。（見圖 11）

阿育王時期的舍利容器

考古出土製作於不同時代和不同地區的舍利容器，其造型並無統一的形制，但從多處阿育王時期前後所造佛塔出土的舍利容器，可見當時以滑石所造的標準雙瓶造型，亦即圓球體的瓶身頂端有一個造型相似的小瓶。上述 Peppé 在皮普拉瓦佛塔發現的石函，其內所裝五個舍利罐中的四個都是標準造形，其中一個的滑石舍利罐上，刻有婆羅謎文 (Brahmī) 書寫的銘文，以下為銘文的轉寫：

*sukitibhatinaṃ sabhagīṣikanāṃ saputadalanāṃ
iyaṃ salīlanidhana budhasa bhagavate <saki>
yanaṃ*

這是第一個被發現，有銘文記載，內裝釋迦遺骨的舍利罐。（圖 17）這段銘文在 1898 年出土後不久，多位歐洲知名梵文學者便競相解讀，都認定銘文顯示，舍利罐內之物為釋迦牟尼佛的舍利。然而更精準周詳地破解這段婆羅謎文銘刻的整體意涵，是在發掘後的一百多年，由德國柏林自由大學退休教授 Dr. Harry Falk 依據考古研究及比對多處古印度碑文實例，將之前多位學者對這段銘文所作的翻譯，作了修正與解讀。他將此銘文翻譯如下：「此〔釋迦族〕佛陀世尊舍利 (śārīra) 的恭奉安置 (nidhāna)，要歸功於非常有名望的〔釋迦族〕兄弟們與其姊妹和他們的兒子與妻子。」這有別於過去以來的翻譯，如德國著名的印



圖 17 刻有婆羅謎文銘文的釋迦舍利罐 取自Mitra, Debala. *Buddhist Monuments*, Photo 35.

度學家 Heinrich Lüders 於 1912 年對此銘文所發表的翻譯：「這個釋迦族的聖者（薄伽梵），佛陀舍利的容器是 Sukiti 兄弟們與其姊妹們以及他們的兒子與妻子（所致贈的禮物）。」而使得整個銘文所要聲明的層面完全地改變成：為了安放佛陀舍利，我們釋迦族建構了這整座的（皮普拉瓦）舍利塔。¹²

繼 Peppé 的挖掘之後，印度政府於 1973 年至 1974 年由 Srivastava 帶領的考古團隊在皮普拉瓦佛塔進行了第二次的發掘，在先前大石函所在地面的下方，發現了兩間位置建



圖 18 印度新德里國立博物館內展示之釋迦佛陀舍利（塔）及舍利罐 1998年作者攝於印度新德里國立博物館

造端正，用磚砌成的隔間，每個隔間內都有一個標準形的滑石舍利罐。這次所發掘到的舍利及舍利罐展示於印度新德里國家博物館（圖 18），在塔前方兩側所示，為阿育王時期標準形的滑石舍利罐。

之所以有多件造型相同的舍利瓶於阿育王時期出現，應該是由於阿育王為了將佛陀舍利分配到全國各地，因而導致了經典滑石舍利罐的產生。然而為何阿育王時期的舍利罐多為圓型的呢？這可能與吠陀時期收集遺骨的習俗有關。佛陀在拘尸那羅入滅後，是由一位

來自毘留提國（Vethadipa）的婆羅門主持荼毘葬禮，而遺骨的處理分配是由另一位名為 Droṇa（香姓）的婆羅門來執行。二位婆羅門應是遵循吠陀時期收集遺骨的習俗與方式來執行葬禮。在古代印度，火葬後的遺骨是用以 palāśa 樹的枝條製成的鉗子來收集，將之放入 palāśa 樹葉製成的葉袋（puṭa）中。犍陀羅有多件鑲板顯示，遺骨很可能是用葉子包裝折疊而成圓球形。¹³ 或許因此之故，這原始葉球的形狀，導致了早期舍利罐多呈現圓形的造型。

皮普拉瓦佛塔出土的五個舍利罐中，有一個是從整塊水晶原石雕製而成的水晶舍利罐（圖 19），容器的形狀類似扁平的地球儀，蓋子上端的魚雕把手，遵循魚的身形輪廓將內部全部挖空，內填七條穿有以寶石作成的六瓣星狀珠子金帶。¹⁴ 其整體高度為 11.5 公分，圓周為 34 公分，直徑為 10.8 公分。如此精美的水晶藝術品應該是皇族才可能擁有的東西，因此推測為阿育王的供奉品。¹⁵



圖 19 出自 Piprahwa 佛塔的水晶盒 取自 Mitra, Debala. *Buddhist Monuments*, Photo 34.

院藏鍍金銅板舍利塔中的印度元素

本文最後將從塔的造形、裝飾與功能，思考院藏的這座鍍金銅板舍利塔具有多少印度佛塔的元素。在外觀造形上，印度阿育王所建的塔和院藏鍍金銅板舍利塔差異很大，前者是覆鉢形，後者為直立的方形結構。但若從塔的結構來分析，阿育王所造的佛塔將塔身立於塔基（平臺）上，塔頂立有一個或多個傘蓋，其四周圍以方形柵欄（方形平頭）的結構，基本上都出現在院藏的鍍金銅板舍利塔上，只是造型風格差異甚大。例如：印度早期佛塔圍繞傘蓋四周的柵欄狀方形平臺（harmika），其原始意涵可能是以柵欄圍繞剎杆及傘蓋，將神聖內部與周圍的世界隔離開來。院藏鍍金銅板舍利塔的方形平頭呈現方式，是在塔剎四角各設一座山花蕉葉，雖然各山花蕉葉之間沒有相連貫而形成原始的圍欄效果，但視覺外觀上，在塔頂處是構成了一個方型空間。

這種差異的形成或可如是理解：印度本土及其他各地的佛塔，常常都是隨著時代及地域而各自有其發展與演變。例如：八王分舍利後，在吠舍離所建的小泥塔，孔雀王朝阿育王使用燒造過的磚塊，將泥塔擴建成磚造塔；而桑奇一號佛塔的核心部分為阿育王所造，到了巽迦王朝，將原先磚造的佛塔包以石頭，並加上四個雕刻精美的石門（torana）及塔周圍的石垣（vedikā）。印度許多佛塔大都經過擴建而變高變大，且裝飾華美，尤其是貴霜王朝犍陀羅地區所造的佛塔，變得高聳而華麗，其造形可從彭楷棟先生所贈的一座古代犍陀羅地區〈奉獻塔〉（圖 20），以及印度加爾各達博物館所藏的一座犍陀羅石雕佛塔（圖 21）略見其梗概。古代犍陀羅地

區相當於今阿富汗東部和巴基斯坦西北一帶，貴霜王朝時期佛法興盛，是佛教傳播到中亞和中國的門戶，此地所造之佛塔，經絲路而東傳至中國內地應是可能的。雖然院藏的這座鍍金銅板舍利塔與江南地區的「阿育王塔」的塔身是方形而不是圓形，但在華麗的裝飾風格上，特別是杭州雷峰塔地宮出土的「鑲金銀阿育王塔」，以及南京長干寺出土的「七寶阿育王塔」，與貴霜犍陀羅佛塔是一致的。

在裝飾內容上，院藏的這座舍利塔，塔頂四角所設的山花蕉葉上有佛傳故事的浮雕，方形塔身的四面各鑄有一個本生故事，其中兩個可確認辨識之本生為：尸毗王貿鴿與月

光王捨頭本生。（見圖1）這種裝飾佛塔的形式可溯源自印度早期佛塔，例如：1873年至1874年由 Alexander Cunningham 主持挖掘，建造年代約在西元前二世紀後半葉的印度巴爾戶佛塔，其石門（圖22）及塔周圍的石垣（圖23）都裝飾精美的雕刻，內容多為本生（圖24）與佛傳（圖25），現今展示於印度巴爾各達博物館。德國印度學學家 Heinrich Lüders 考訂了巴爾戶佛塔浮雕上的銘文，並與現存巴利文本生經中的本生故事做了比對，據此而辨識了巴爾戶佛塔浮雕上四十一個本生故事。¹⁷ 早在佛教教義仍以口誦方式流傳，尚未被刻寫下來之際，許多本生故事被視為



圖20 巴基斯坦 古代犍陀羅地區 6世紀 青銅薄片奉獻塔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1 出自Loriyan Tangai的犍陀羅小型石雕佛塔 2005年作者攝於印度加爾各達印度博物館



圖22 | 西元前2世紀後半葉 巴爾戶佛塔的石門及周圍的石垣 2005年作者攝於印度加爾各達印度博物館

可教化人心的重要佛教教義，而被用來裝飾於佛塔四周。而這種早期佛法傳播的方便法門，歷經千年之後，依舊奉行於唐宋之際的江南地區。

在功能上，據院藏金銅板舍利塔的銘記，此塔為舍利塔，然由於此塔乃1996向彭楷棟先生所購藏，並無任何考古出土記載，所以不知原先塔身內部及其周圍放置之物為何。但若比對離車族所建最早舍利塔中的金葉、玻璃珠、小海螺及銅幣；北印度皮普拉瓦佛塔內的金、銀、瑪瑙和孔雀石等半寶石做成的珍寶；南印度阿瑪拉瓦蒂（Amarāvati）大支提塔



圖23 | 西元前2世紀後半葉 巴爾戶佛塔周圍的石垣 2005年作者攝於印度加爾各達印度博物館



圖24 西元前2世紀後半葉 巴爾戶佛塔石垣上的九色鹿本生浮雕 2005年作者攝於印度加爾各達印度博物館



圖25 西元前2世紀後半葉 印度巴爾戶佛塔石垣上的佛傳（乘象入胎）浮雕 2005年作者攝於印度加爾各達印度博物館



圖26 平山郁夫收藏的Gandhara舍利盒文物 2018年作者攝於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

（Mahāchaitya）內供養舍利的珠子、珍珠、半寶石以及金花；¹⁸平山郁夫收藏的一整組西元一世紀犍陀羅舍利容器與供養品（圖26）中有多片金葉及各色寶石；多處江南地區地宮出土的玉石、瑪瑙、水晶、珊瑚、銅錢等

供養品，便可理解以各式珍寶供奉佛陀舍利的傳統，從北印度的八王分舍利，一直延續到唐宋之際的江南地區。平山郁夫所藏的犍陀羅舍利容器中，有符合印度傳統的圓形石製舍利容器；其中四個大小不等，分別用金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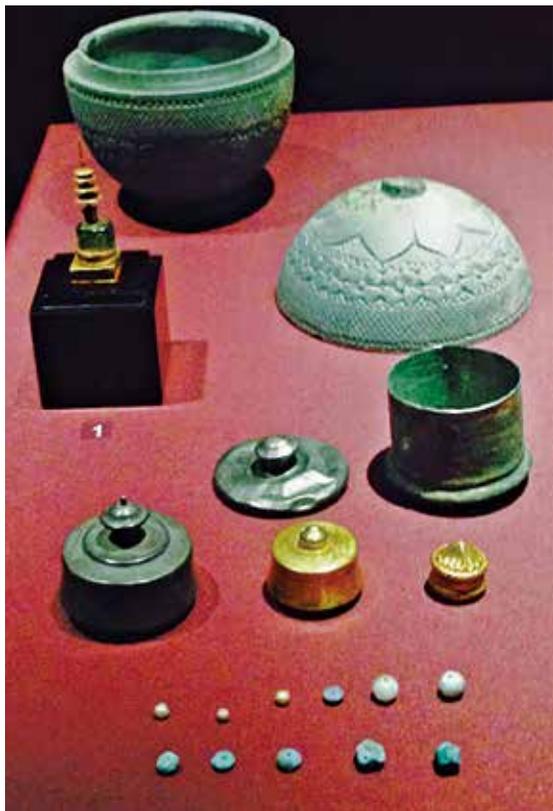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27 平山郁夫收藏的Gandhara舍利盒、多重的舍利罐及一座小塔
2018年作者攝於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

銀製成的圓筒形帶蓋容器，似乎是可套裝放入灰色片岩的圓形舍利容器中（圖 27）。這令人聯想到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，其瘞藏的一枚佛指舍利放置於八重寶函中；以及上海青浦青龍鎮隆平寺塔出土，盛裝木貼金臥佛所用的多重套函。平山郁夫收藏中的一座西元 2～4 世紀犍陀羅塔形玻璃舍利容器，塔身為玻璃製，四重塔剎及塔座皆為金製，其造型已有別於印度早期的覆鉢形佛塔，而更接近院藏金銅板舍利塔了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覽處

註釋

1. 本文主要參考：一、印度考古研究院出版：Debala Mitra, *Buddhist Monuments* (Calcutta: Sahitya Samsad, 1980). 以及二、Dr. Hary Falk, "The Ashes of the Buddha," in *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* 27 (2013): 43-75.
2. 有關月光王本生相關的文本與藝術遺存請詳：張文玲，〈佛經文本與藝術遺存所呈現的古代文化交流——以月光王本生為例〉，《敦煌研究》，2019 年 1 期。頁 7-19。
3.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（新竹縣：正聞出版社，1989，第 6 版），頁 45-46。
4. 以上資料為筆者於 2004 到訪印度八大聖地吠舍離時，遺址當地的說明告示內容。另請參考：Debala Mitra, *Buddhist Monuments*, 23, 75.
5. Monier William, *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* (Delhi: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, 1987), 1066.
6. 印度考古研究院對石柱上所刻五行銘文的解讀，與德國學者 Dr. Harry Falk 的解讀不盡相同，請詳印度考古研究院出版品：Debala Mitra, *Buddhist Monuments*, 267.
7. Hary Falk, "The Ashes of the Buddha," 50-52.
8. Hary Falk, "The Ashes of the Buddha," 56-58.
9. Hary Falk, "The Ashes of the Buddha," 52-53; 另請參考：S. L. Huntington, *LAY RITUAL IN THE EARLY BUDDHIST ART OF INDIA: More Evidence against the Aniconic Theory* (Amsterdam: Royal Netherlands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, 2007).
10. Debala Mitra, *Buddhist Monuments*, 74.
11. Debala Mitra, *Buddhist Monuments*, 91, 97.
12. Debala Mitra, *Buddhist Monuments*, 24.
13. Hary Falk, "The Ashes of the Buddha," 59-60.
14. Hary Falk, "The Ashes of the Buddha," 46, 50, 68.
15. Debala Mitra, *Buddhist Monuments*, 79.
16. Hary Falk, "The Ashes of the Buddha," 53-54.
17. Heinrich Lüders, "Bhārhut und die buddhistische Literatur," in *Deutsche Morgenländische Gesellschaft* 26, no. 3 (1941), 132-135.
18. Debala Mitra, *Buddhist Monuments*, 202.